

歌曲令曲四指匀
 破近六均慢八均
 官拍艳拍分轻重
 七敲八指鞞中清
 大顿声长小顿促
 小顿才断大顿续
 大顿小住当韵住
 丁住无牵逢合六
 慢近曲子顿不叠
 歌飒连珠叠顿声
 反掣用时须急过
 折拽悠悠带叹音



• 丁放 著

金元词学研究



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元词学研究/丁放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5
ISBN 7-5004-3312-3

I. 金… II. 丁… III. ①词(文学)—文学研究—中国—金代
②词(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元代 IV.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4904 号

责任编辑 罗 莉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5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5 插页 4

字 数 224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 金元词学研究

科研工作，90年代前期，曾负笈北大，在著名学者袁行霈先生门下做访问学者，在袁先生的指导与率领下，合作完成《中国诗学通论》一书（袁行霈、孟二冬、丁放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版），该书曾荣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全国普通高校第二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反响。

近年来，丁放将学习和研究的重心转向词学理论，并赴河北大学，在刘崇德、詹福瑞先生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如今，其博士毕业论文《金元词学研究》修订完毕，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问序于予，予亦欣然应命，乐为之序。

长期以来，宋词研究成为显学，金元词学则鲜有人问津，研究成果也寥若晨星，其独特的文化意义和学术价值迄未得到应有的承认，近年来，方智范、邓乔彬等先生合著的《中国词学理论史》、谢桃坊先生的《中国词学史》对金元词学有过描述，吴熊和先生的《唐宋词通论》也作过梳理。丁放的这部《金元词学研究》在时贤研究的基础上又有突破和进展。本书对金元词学作了全方位的、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具有独立的学术品格和填补学术空缺的意义。

本书收集的资料比时贤的同类著作更加完整丰富，虽难说已将宋金元人著述中的有关词学理论资料网罗殆尽，但主要的理论资料均已涉及，如元人王礼《胡涧翁乐府序》和戴表元《王德玉乐府倡答小序》等序跋之文，时贤甚少注意，本书首次拈出，更能看出金元词学的特色。本书提出了一系列证据充分、论述详密的新见解，如揭示出宋代词学留给金元词学的两大话题，即词乐研究与词论研究，指出词乐亡于元初并揭示其原因，揭示出金元词论的基本特点。本书将词学选本（总集）作为一种特殊的批评方式纳入词学理论的视野中来，扩大了词学理论批评的领域，从

中透视出金元词学批评的走向，颇多创见，如指出周密《绝妙好词》对黄昇《绝妙词选》的继承，对张炎《词源》、陆辅之《词旨》的直接影响，都是发前人所未发。本书将词的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结合起来研究，理论与作品互证，方法可取，且有实效。作者坚持考论结合的方法，将理论分析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史实辨证的基础之上，如对《元草堂诗余》思想倾向的分析，就是先对其所选之词人的生平事迹作了系统考察，其中詹玉入元为官且有不法行为之事，系首次发现，订正了前人有关评价的偏失。本书对金元词学接受史的研究，也具有较大创新意义，如论述《词源》与《乐府指迷》名称的离合轨迹，论《词源》对清代词学的巨大影响，论《乐府补题》的主旨，均能独抒己见，且对时贤之论有所驳正，结论可信可据。

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丁放在词学研究方面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开了一个好头，愿他在今后的学术生涯中，脚踏实地，努力进取，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余恕诚

2001年岁杪于芜湖安徽师范大学

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目 录

序.....	余恕诚(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本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	(1)
第二节 唐宋词学的发展及其对 金元词学的启示与影响.....	(4)
第三节 词乐在唐宋时期的发展 与演变	(14)
第四节 20 世纪金元词学研究 现状	(19)
第二章 金元词乐研究	(26)
第一节 金元词乐的源流演变	(26)
第二节 金元词乐衰落的标志	(30)
第三节 金元词乐衰落的时间及 其原因	(36)
第四节 从金元词的演唱看词乐 的衰落	(43)

第三章 金元词学总集研究	(49)
第一节 《中州乐府》与金源词风	(49)
第二节 《绝妙好词》与雅正派词论	(59)
第三节 《元草堂诗余》与“草堂”系列	(69)
第四节 金元时期其它词学总集	(79)
第四章 张炎《词源》对宋代词学的总结	(96)
第一节 杨缵与宋末的词乐理论及其影响	(96)
第二节 “吴氏家法”与沈义父《乐府指迷》	(102)
第三节 张炎《词源》与元代词乐研究	(108)
第四节 张炎《词源》与雅正派词论	(124)
第五节 陆辅之的词论	(134)
第五章 金元之交的词论	(138)
第一节 王若虚“是苏非黄”的词学观	(143)
第二节 元好问与金代主流词论	(159)
第三节 刘祁《归潜志》的词论与词史价值	(169)
第六章 元代词论	(177)
第一节 周密各种笔记中的词论	(178)
第二节 元代词集序跋中的词论	(188)
第三节 元代诗话与笔记中的词论	(198)
第七章 后世对金元词学的接受	(210)
第一节 《绝妙好词》接受史述论	(210)
第二节 《乐府补题》的接受与“比兴寄托”说的演变	(232)

第三节 张炎《词源》接受史述论	(253)
第八章 结论	(279)
参考文献	(284)
后记	(293)

第一章

绪论

词在宋代臻于极盛，词学研究者对宋代词学关注较多，各种词学史均给宋代词学以较大篇幅，而对紧承宋代的金元词，或许因为其成就不高，学者们往往较少留意，近年来虽有论金元词的博士论文（如赵维江《金元词研究》、陶然《金元词通论》等两种），但对金元词学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却不多见，故本选题既有开创性，又有挑战性。

本绪论包括四节：第一节，本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第二节，唐宋词学的发展及其对金元词学的影响；第三节，词乐在唐宋时期的发展与演变；第四节，20 世纪金元词学研究现状。

第一节 本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

金元两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两个特殊的朝代。金朝（1115—1234 年）是由女真贵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它是在与南宋不断交战并取得胜

2 金元词学研究

利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其后期则受到南宋与蒙古的两面夹击。元朝（1235—1368年）是由蒙古族在灭了金与南宋后建立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封建王朝。这两个朝代的文化，均上承宋朝，又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以词的发展为例，金元处宋词极盛之后，虽无法再现当年盛况，但某些词人仍取得较高成就，且在词学理论上多有建树，对宋词的创作经验作了很好的总结，对金元词自身的特点，也有较为科学的概括。但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金元词学的研究，虽有一些零散的成果，但进行系统、综合研究的著作尚不多见，本书拟对金元词学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力争有所突破。

本书主要研究金元两朝的词学理论，对金元词的创作实践不拟作审美分析与价值判断，一是体例所限，二是这方面的大著已有赵维江博士的《金元词研究》、陶然博士的《金元词通论》二书足资参考。不过，在论述金元词学理论时，有时也不免牵涉到一些词作。

金元词学家应包括哪些人，具体的时代归属如何，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陶然博士的《金元词通论》提出“以创作为主导”、“依事迹而推定”、“原心迹为辅助”、“取两存以兼顾”的四项标准^①。《全元文·凡例》云：“本书所收作家之时限原则上承金和南宋，原金朝管辖区作家以金哀宗天兴三年（1234年）为上限；原南宋管辖区作家以南宋赵昴祥兴二年（1279年）为上限；以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为下限。由金、宋入元，由元入明作家，其主要活动在元者，则作为元人收录。”^② 这些标准当然可

① 陶然：《金元词通论》第一章第二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版。

② 《全元文》第1册，《凡例》第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版。

以供我们参考，但本书亦有自己的划分标准，即以诗论著作产生的时间为主要依据，总体从宽，且考虑某些特殊情况。现将可能引起归属争议的章节的分期根据简述如下：《金代词论》章分三节，以王若虚、刘祁、元好问各列一节。其中王若虚（1174—1243年）主要生活在金代，其《滹南诗话》论词，是苏而非黄，是典型的金人议论，将其归入金代，自无异议。刘祁（1203—1250年）的词论主要见其《归潜志》，顾名思义，显然作于金亡之后。元好问（1190—1257年）的《中州乐府》及某些词集序跋，也多作于金亡之后。将他们二人列入金朝，一是“原其心迹”，刘祁以“归潜”名斋，显然以金朝遗民自居；元好问金亡不仕，亦自居金人。二是从二人词论的内容来看，刘祁所记皆金代词人之事，元好问撰《中州集》（《中州乐府》为其附录），更是以保存金朝的故国文献为己任，故宜将二人列入金人范围。三是若将刘祁、元好问二人列入元朝，则金代词论几成空白，故依本书“从宽”之例，将他们列入金朝。本书将张炎的《词源》专列一章加以讨论，张炎生于1248年，卒年则一般认为在1320年之后，王兆鹏教授《唐宋词史论》说张炎“活到了元英宗至治（1331—1333年）年间”，^①而且其《词源》刊行于1317年，此时宋亡已逾四十年，故宜将其列为元人，而不宜划为宋人。《金元词学总集研究》一章将元好问《中州乐府》列入金朝，是随元好问的归属而定的。论周密《绝妙好词》一节，因《绝妙好词》编定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前后^②，且周密《齐东野语》、《癸辛杂

① 见王兆鹏：《唐宋词史论》第一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43页。

② 见吴熊和：《吴熊和词学论集·〈宋人选宋词十种〉跋》，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125页。吴熊和《唐宋词通论》则说《绝妙好词》编定于1295年，见该书第345页。

识》、《浩然斋雅谈》诸笔记亦均作于宋亡之后，故将周密划入元人；《乐府补题》约作于1291—1293年之间^①，故亦应划为元人著作；《元草堂诗余》有作于1298年的词，故亦划归元代。

本书研究的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一、词话，如张炎《词源》、陆辅之《词旨》和吴师道《吴礼部词话》等；二、词学序跋之文；三、词乐资料；四、词学总集（选本类）；五、诗词创作中的词学理论；六、各种笔记、小说、野史中的词学资料。

本课题主要解决以下问题：金元词乐衰亡的背景、原因、过程及表征，金元词学总集的文献价值与理论意义，金元词论的发展状况及其特点，金元词学的接受过程与特征。

第二节 唐宋词学的发展及其对金元词学的启示与影响

词，又名曲子词，又可称为乐府，又被后人叫做诗余，实为诗的分支。唐代为词的初兴阶段，词论上几乎无足称述，只有李德裕的《玄真子渔歌记》和刘禹锡的《竹枝词序》勉强算得上词学论文，其中李文主要记载玄真子张志和的生平；刘文对儿歌中的《竹枝词》评价较高，刘禹锡说：“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伧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受楚风的影响，刘禹锡自己也作了九首〔竹枝词〕，并明言有“变风”之意。这段文字

^① 见吴熊和：《吴熊和词学论集·〈宋人选宋词十种〉跋》，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124页。

是对处于草创时期的民间词的生动记录，虽然简短，却有较大价值。

唐五代之词，哀感顽艳、缠绵悱恻、以歌咏两性间关系为主要内容。被誉为民间词的鼻祖、倚声家“椎轮大辂”^①的敦煌曲子词中，描写爱情、怨思，尤其是征夫思妇相思离别的作品，就已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文人词如《花间》、《尊前》所录者，更是以女性化为基本特征。词之初起，就是配合燕乐、以女性为中心、极尽哀乐之情的歌词。而词的这一特点，无疑对早期的词学理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首先体现在五代词人欧阳炯的《花间集序》中。《花间集》^②是第一部文人词的选集，该书共十卷，哀辑温庭筠等十八家“诗客曲子词”共五百首，欧阳炯的序即为词学史上最早的较为成型的词学论文。文中首先指出“曲子词”与前代歌词一脉相承的关系，其次点明这些歌词都是合乐的，然后描写词的创作过程和特点云：“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有唐已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姮娥。”^③序文对历代艳歌都持肯定态度，对“南朝之宫体”、“北里之倡风”，也是欣赏的。这说明词论兴起之初，即与儒家传统观念及“诗教”说有相当的距离。

① 朱孝臧：《云谣集杂曲子跋》谓《云谣集》三十首：“其为词朴拙可喜，洵倚声中椎轮大辂”。

② 《花间集》编成于后蜀广政三年（940年），编者为后蜀赵崇祚，选录自唐开成元年（836年）至后晋天福五年亦即后蜀广政三年以前的词家，有温庭筠、皇甫松、韦庄等十八家共五百首词。

③ 《花间集序》，据《全唐文》卷八九一。

北宋前期虽然出现了晏殊、柳永、欧阳修、张先、晏几道等词人，词学理论上却无所建树，直到苏轼与苏门弟子登上词坛，词论才开始初具规模。苏轼没有专门的词学论著，但是他有一些关系到词理的书简与题跋，当时的一些诗话著作等，也记录了他的一些词学观点，据此，我们可以窥见东坡词学的概貌。其词论主要讲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东坡作词论词，都主张自成一派，立志与风靡一时的柳永词分庭抗礼，充分显示出苏轼作为一代词宗的胆略与气魄。”“第二，苏轼用论诗的标准来论词，认为词是诗之‘余技’，并未将词提到与诗相同的地位。苏东坡在《题张子野诗集后》一文中，盛赞其诗，并说其词不过是‘余技’。”“因此，在承认东坡推尊词体、扩大词境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他并不认为词像诗、文那样重要。从他现存的三百多首词来看，虽然能够‘指出向上一路’，打破《花间》、柳永一派的藩篱，但许多较为严肃、重大的主题，他在词中涉及较少，而多在诗、文中表现。他曾说‘诗、文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这正和他说词为‘小词’、‘余技’，是一致的。东坡的这一观点，引发了南宋的‘诗余’说。”^①

东坡的学生与门客黄庭坚、张耒、晁补之、李之仪、陈师道等人，都有一些论词的文章，其中黄、张的观点接近苏轼，而又有一定变化。

黄庭坚《小山词序》同样坚持“以诗例词”的观点，认为晏几道（小山）词：“可谓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岂减《桃叶》、《团扇》哉！”他将小晏词比作《高唐》、《洛神》赋和《桃叶》、《团扇》诗，既是以词

^① 引文见袁行霈、孟二冬、丁放：《中国诗学通论》第四章第七节，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比附诗赋，又强调词“言情”的特质，与苏轼的观点同中有异。张耒曾为词人贺铸的集子作序（《东山词序》），将贺铸词比作屈、宋、苏、李的诗赋，与苏、黄以诗评词的观点是一致的。他强调贺铸词“盛丽”、“艳冶”的风格特点，则与苏、黄的看法不同。

晁补之的《评本朝乐章》^①，与苏、黄的词论有较大的距离，他对于苏轼，一方面说其词“不谐音律”，另一方面又说“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中缚不住者”，还算较为客气。评黄山谷词“固高妙，然不是当家语，自是着腔子唱好诗”，显然是站在词之当行家的立场上说话。晁氏评欧阳修词为“绝妙”，“自是后人道不到处”，评柳永〔八声甘州〕词“此唐人语，不减高处”，评晏几道（晁氏误为晏殊）“不蹈袭人语，而风调雨雅”，评张先词“韵高”。对秦观则评价极高：“近世以来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虽不识字，亦知是天生好言语。”李之仪的《跋吴思道小词》说“长短句于遣词中最为难工。自有一种风格，稍不如格，便觉齟齬”。认为词在艺术上应有很高的标准，强调词“自有一种风格”，下开李清照的词“别是一家”说。他认为作词应“以《花间》所集为准”，“辅之以晏、欧阳、宋，而取舍于张、柳”，这其中并无苏、黄词一席之地，其论词宗旨由此可见。出自苏门的陈师道，自以为词近秦七、黄九，亦与苏轼的主张距离较远。^②

李清照的《词论》^③是北宋词学的总结，也是宋代最苛刻的

①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引。

② 张惠民《宋代词学审美理想》上编第一章“苏门论词与词学的自觉”，对苏门词学有较为具体的论述，可以参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4月版。

③ 《词论》为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和魏庆之的《诗人玉屑》收录。

词论，约作于北宋末。《词论》主要内容有三：一是叙词史，二是评词人，三是论音律。其作家论尤能见其个性：她批评柳永“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张先、宋祁兄弟等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她认为晏殊、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等人诗文虽佳，但他们的词只不过是一些让人发笑的、徒具长短句形式的诗而已，而且还不协音律。对于那些词风与自己相近的词人，易安评价较高，但也有所保留：“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① 所论虽不为无据，但因自视过高，故持论过苛。

由唐至北宋，词的创作与理论方面，均呈现出一种较为自由的状态，与政治、与社会现实保持一定距离。有些文人的诗、文典雅庄重，词却活泼自如，不避浮艳。如欧阳炯曾模仿白居易的《讽谕诗》，作了五十首献给蜀主，反对奢侈淫靡，与他《花间集序》的观点判若两人。这种现象表明：当时人们对诗和词的性质与功用，看法颇为不同：在一些庄重的场合，应当作一些冠冕堂皇的严肃的诗、文；在歌筵舞会上，作几首风流旖旎的小词，调节一下情绪，活跃一下气氛，亦无伤大雅。于是诗言志、词言情，诗庄词媚，就成了士大夫们一致的看法。欧阳炯《花间集序》对词的提倡，《花间集》作品对词人的熏陶，对这种观点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北宋一些以道德文章名重一时的人物，如晏殊、欧阳修等，所作小词皆沿五代之习，颇为柔靡。柳

^①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版，第254页。

永更以其俚俗的词句，市民的生活，将“花间”词重音律、多写男女之情的特点作了进一步发展。李清照以女性自抒其情，更以爱情相思为词之主旋律。

南宋前期，词学界对苏轼、辛弃疾一路的词风较为欣赏。如关注《石林词跋》（作于1147年）说叶梦得（石林居士）年轻时作词“婉丽绰有温、李之风”，“晚岁落其华而实之，能于简淡时出雄杰，合处不减靖节、东坡之妙，岂近世乐府之流哉？”胡寅的《酒边词序》称赞苏轼：“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蔡戡《芦川居士词序》说张元干词“文词雄健，气格豪迈”，“又岂与柳、晏辈争衡哉？”汤衡《张紫微雅词序》肯定苏轼反对“粉泽之工”的成绩，又说学苏轼者“嬉弄乐府，寓以诗人句法，无一毫浮靡之气，实自东坡发之也”。认为张孝祥的词“如《歌头》、《凯歌》、《登无尽藏》、《岳阳楼》诸曲，所谓骏发踔厉，寓以诗人句法者也”。陈应行《于湖先生雅词序》说读张孝祥词的感受云：“比游荆湖间，得公《于湖集》所作长短句……其潇散出尘之姿，自在如神之笔，迈往凌云之气，犹可以想见也。”陈鬯《燕喜词叙》曰：“后世《阳春白雪》之曲，其歌诗之流乎？沿袭至今，作之者非一。造意正平，措词典雅，格清而不俗，音乐而不淫，斯为上矣。高人胜士，寓意于风花酒月，以写夷旷之怀，又其次也。若夫宕荡于检绳之外，巧为淫褻之语以悦俚耳，君子无取焉。议者曰：少游诗似曲，东坡曲似诗。盖东坡平日耿介直谅，故其为文似其为人。歌《赤壁》之词，使人抵掌激昂而有击楫中流之心；歌〔哨遍〕之词，使人甘心淡泊而有种菊东篱之兴；俗士则酣寐而不闻。少游情意妩媚，见于词则秾艳纤丽，类多脂粉气味，至今脍炙人口，宁不有愧于东坡耶？”后来的一些词论家开始重视

辛弃疾词，并将其与东坡词划归同一派。宋孝宗淳熙十五年戊申（1188年），辛弃疾四十九岁时，辛的门人范开，编刊《稼轩词甲集》成，作序云：“世言稼轩居士辛公之词似东坡，非有意于学坡也，自其发于所蓄者言之，则不能不坡若也。……虽然，公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方将敛藏其用，以事清旷，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耳。故其词之为体，如张乐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又如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观。无他，意不在于作词，而其气之所充，蓄之所发，词自不能不尔也。其间固有清而丽、婉而妩媚，此又坡词之所无，而公词之所独也。”^①刘克庄《辛稼轩集序》曰：“公所作大声镗鞳，小声铿匏；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秣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

受这些观点影响，宋元之交的词人刘辰翁也给苏、辛词以高度评价：“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然犹未至用经用史，牵雅、颂入郑、卫也。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轩横竖烂漫，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笳万鼓，平生不平事并卮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词至此亦足矣。”^②元好问的词论也以提倡苏、辛为宗旨。南宋后期的一些词论家则大力倡导“雅词”，如詹傅《笑笑词序》称郭应祥词“典雅纯正，清新俊逸”；张铉《梅溪词序》说史达祖词“情辞俱到，织绡泉底，去尘眼中，妥帖轻圆，特其余事”；林正大《风雅遗音序》称己作“婉而成章，乐而不淫”；柴望《凉州鼓吹自序》将词分为三等：“大抵词以隽永委婉为上，组织涂泽次之，呼嗥叫啸抑末也。”不过，宋末重

① （明）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本《稼轩词》。

② 刘辰翁：《须溪集》卷六《辛稼轩词序》。